

“入关学”的话语生成结构及其出路

马逸凡

“入关学”引起热议已有半年之久。和“入关学”同样有趣的，是评论界对它的回应。由于立场观点分殊，无论是评论人士还是“键政圈”网民参与讨论的热情远超预期，大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蕴。评论界对“入关学”的回应大多是寓述于评。本文尝试以寓评于述的方式，对“入关学”的话语进行一个过程性和结构性的分析。所谓过程性分析，即勾勒出“知乎键政圈”和“入关学”话语演进的时间线；所谓结构性分析，即勾勒出“入关学”的话语结构，并揭示其实质。

本文认为，“键政圈”讨论环境对“入关学”的影响非常显著。“入关学”本质上是自媒体时代娱乐化的影射史学，其理论图景的展开模式和即时战略类游戏非常相似，与大家热议的地缘政治学关联反而不大。在“入关学”话语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形象较为负面。这与网络舆论环境紧密相关，同时也反映了“入关学”权力观的缺陷。

一、“键政圈”的时间线和类型学

所谓“键政”是“键盘政治家”的简称，这一概念所经历的褒贬变化过程与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和舆情生态的变化息息相关。有业界人士以1994年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为起点，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4—2000年）从四大门户网站发展到了搜索引擎；第二阶段（2001—2008年）从搜索引擎发展出了社交化网络；第三阶段（2009年之后）从PC互联网发展到移动互联网。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官民互动也在各种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下，从抗争性政治逐步演化为回应性政治。^①在“以抗争求回应”的过程中，“上网VS上街”的争论成为每一次网络抗争的“保留节目”。在泛娱乐化的网络生态下，论辩双方由最初的激烈辩论转向了相互调侃、揶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键盘政治家”一词从贬义概念变成了带有诙谐色彩的描述性概念，“键政圈”的概念由此形成。

2012年之后，网络的舆论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批活跃于2012年之前，带有鲜明意识形态倾向的网络平台退出公共舆论空间。在此之后，“键政圈”整体上很少涉足“抗争性政治”的相关议题，从而转向对政治经济学和“大历史观”等议题进行诙谐幽默的评述和讨论。借用游戏《龙与地下城》的表述，“键政圈”近年来从“混乱邪恶”转向了“守序中立”，并且还发挥了一定的知识传播与生产的功能。正是在这一时间点上，知乎成为网络“键政圈”的主阵地之一。

近年来，一方面，随着资深用户群体的不断积累，以及学历的提高和思想的成熟，知乎平台的“政治正确”逐渐从自由主义转向了“工业党”、世界体系论等相对亲体制、亲左翼的观点。

^① 详细参见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闫帅：《从抗争性政治到回应性政治：中国政治秩序再生产的逻辑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另一方面，知乎以“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和“发现更大的世界”作为宣传口号，以“意见领袖”和“新知人群”为主打，吸引内容生产型用户。给读者带来了大量来自不同行业、不同社会群体的“地方性知识”，客观上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观有一定的祛魅作用。作为对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回应性解释，“入关学”以其鲜明的立场将“知乎键政圈”带向了公共舆论，也彻底洗去了其早期“抗争性政治”的色彩。在2020年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的一次题为“发出青年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主题分享会上，“入关学”被称为当代青年“自我思政”的一个典型案例。

回顾这一过程时，不难发现：“键政圈”的演化过程包括大小两条时间线：“大时间线”是“键政圈”主要依托的网络平台的变化；而“小时间线”是“键政圈”代表性的内容生产者和话语体系更新的过程。前者对应着广义的“大键政圈”，涵盖的时间较长，呈现快速更新、赢者独占的趋势；后者对应着狭义的“知乎键政圈”，涵盖的时间较短，呈现出“积累式发展”的面貌。

在“大时间线”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键政圈”始终在寻求功能更完善、界面更友好的论坛和社交媒体。博客、人人网、微博、微信公众号、知乎等平台都先后成为“键政圈人士”的主要聚集地。此外，还有一些立场较为鲜明的政论性网站和网络文化社区（如北斗网、B站、豆瓣等），也曾在“键政圈”拥有一席之地。目前，随着高质量用户的流失，博客、人人网在“键政圈”的影响力已经衰落；微博由于一度成为“网络维权”的聚集地和网络审查的重点，有争议色彩的账号也早已迁移；知乎则基于其宣传定位和用户群体，拥有规模相对适中的用户群体和影响力。“新知人群”的不断增长既能不断巩固平台的商业价值，又由于有一定知识门槛而不容易快速形成全网热议的话题——换言之，就是处于品牌价值的上升期和舆情监测的安全区。因此，“大时间线”呈现的是各大平台网之间核心用户争夺战的结果。哪一个平台吸引了大多数高质量的内容生产者，就能吸引大多数读者，因而呈现出“长江后浪推前浪”“赢者独占”的趋势。在“大时间线”上，“入关学”处于“键政圈”网络平台和核心读者群稳步发展的阶段。

在“小时间线”上，当知乎成为“键政圈”主阵地时，“键政圈”已经发展到了借鉴政治经济学理论，开始建构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的阶段，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一定的“内卷化”倾向。与此同时，虽然网络平台更替迅速，但是“键政圈”的高质量作者却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许多“键政大V”进军知乎前，就已经在各类社交媒体、文化社区、知识付费平台积累了相当的知名度。此外，还有一些“史学大V”也是“知乎键政圈”的参与者。由此，演化出了一批“自媒体化”的全栖内容生产者，例如偏左翼的“马前卒”、偏右翼的“王陶陶”等人。他们在“知乎键政圈”的内容输出承接了以往的读者群体、思想成果和管理经验，后者包括经营账号、扩大影响的经验，也包括适应各种审查机制的经验。在“小时间线”上，“入关学”处于一个“键政圈”不同阶段的经验成果相互汇聚的阶段。同时，这也导致“键政圈”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圈子，其核心作者和读者基本盘以及观点分化的情况与历史爱好者群体有很大重合。所以，在2014年前的网络左右论战中，“键盘政治家”和“历史发明家”两个概念常被部分网民混用。

在“键政圈”的两条时间线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对“入关学”相关的“知乎键政大V”及其观点做一个时间线和类型学的分析。有网友将“入关学”的演进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山高县”开创了“入关学”；“曹大佐”重新定义了“入关学”，即“曹氏入关学”；之后的“入关学”

面临着向何处发展的问题。此外，围绕着“入关学”的争论又衍生出了“东出说/秦王扫六合说”“四野入关学”等其他解释框架，“入关学”内部也形成了许多小的流派，诸如李建秋、王瑞恩（已与曹学合流）、Fan Francis、龙牙等等。^①正如傅正博士所说，这其中也存在着概念的包装与营销的问题，比如美国保守派思想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对“楚王问鼎”的再诠释也可以被视为“问鼎学”。

有网友选取“嵩氏入关学”（嵩氏指“山高县”）和“曹氏入关学”为例，分析了二者的理论基调和对大明—女真根本矛盾、入关方式认识的异同（见表1）：

表1 “嵩氏入关学”与“曹氏入关学”对照表

	嵩氏入关学	曹氏入关学
学说基调	具象，多运用代称和比喻	激进，抽象，模糊化，避免呆板的历史时位
对入关根本矛盾的认知	认为入关的根本矛盾在于国与国之间的阶级压迫，是建州不断扩张生存空间的需要和大明对建州的无情压制之间的矛盾	认为入关的矛盾是基于建州内部的高内卷化，建州的内卷化是思想文化缺陷，是属于内部结构性问题，入关学可以及早打破社会的内卷。但曹氏入关学同样默认外部有意识的压迫是导致国内内卷化的部分原因
对入关方式的态度	认为方式是徐徐图之，不可速成、不可妄谈，日拱一卒。以自由贸易的方式主导全球经贸体系，韬光养晦、釜底抽薪地进行入关，同时也坚决反对一味的媾和	认为欲肉体入关，必先精神入关，提出要以文化宣传的方式来使入关情绪蔓延在人民群众之间，积极地进行思想更新，必须让人民明白“关必入，明必伐”，打破“挖参求活”的错误思想

资料来源：知乎专栏（知乎@寒冬月）

也有网友根据经济上的左右之分和政治上的威权—民主之分，用苏联和纳粹德国、明朝和清朝分别比附“入关学”话语体系中的不同观点。事实上，“苏德之争”也一直是网络“军迷圈”、“军武圈”和“键政圈”反复热炒的辩题。

上述分类方法可谓见仁见智，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有一定“泛娱乐化”的色彩。如果我们严肃地看待作为话语体系的“入关学”，就会发现各派的观点异同仍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之内。概括地说，“入关学”和“反入关学”各流派分歧主要存在于两个层面：（1）决定大明与女真族冲突的根本因素是国际因素还是国内因素，即内外矛盾孰轻孰重；（2）意识形态领域是否重要，即“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勾勒出“入关学”理论核心假设的类型学：

^① 知乎用户“寒冬月”：《关于“入关学”提出以来的若干历史决议》，知乎专栏，<https://zhuankan.zhihu.com/p/1331928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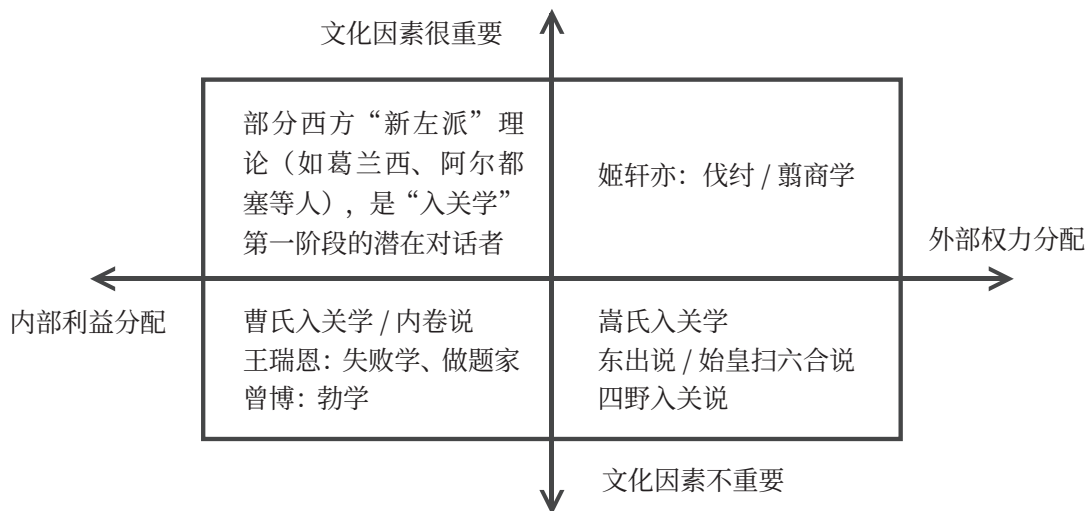


图1 “入关学”理论核心假设的类型学

从图1中可以看出，“山高县”的“嵩氏入关学”是“入关学”理论展开的起点，“翦商学”“曹学”“勃学”“失败学”是其向分配因素和文化因素两个方向的延伸。而强调内部利益分配和意识形态因素的西方“新左派”理论，是“入关学”的潜在论敌，也是从反面催生“入关学”的潜在因素。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理论延伸”是结构和逻辑层面的，不是简单的时间先后。尽管许多关于“勃学”“失败学”的讨论出现在“入关学”之前，恰恰是“嵩氏入关学”对根本矛盾在外的笃信，帮助它们明确了理论内核和边界。

二、“入关学”话语结构

(一) 理论图景

许多人认为，“入关学”的理论图景是通过地缘政治学来展开的，实则不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对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解有两个传统。拉考斯特（Yves Lacoste）指出，对一些人来说，地缘政治学是伪科学，甚至是一个犯罪的知识进程，它是帝国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地缘政治学是一门新科学，或至少是一种观察世界设定问题的新方法。^①第一种观点直接支撑了邢麟舟等人对“入关学”最常见的批评——法西斯主义 /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种；^②第二种观点则可以用于分析“入关学”理论图景展开的路径究竟是什么。

作为“知乎键政圈”的热议话题，“入关学”理论展开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内容和场域两个方面。前者即历史学的学科属性（或者说科学性），后者即网络社群给予该理论的影响——娱乐性。“入关学”所立足的历史场景是17世纪明清两大集团在东北亚的战略竞争，涉及的内容包括两大集团的文明形态、周边环境、国际地位、战略取向等等，处理这些议题需要引入的学科包括国际政治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这意味着研究这一问题所需要的史料基础极为庞大，涉及山川地理考据和来自少数民族的史料——这方面，民国的“边政学”、日本的“骑马民族说”和

^① Yves Lacoste, “Rivalries for Territory”, in Jacques Lévy ed., *From Geopolitics to Global Politics — A French Connection*, London: Frank Cass, 2001, p.126.

^② 邢麟舟：《评入关学：极端自我对象化及其风险》（2020年4月26日），微信公众号“无隅”，<https://mp.weixin.qq.com/s/ZZOemG4p6F1BFmwX7mf73A>

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已经做出了尝试（姑且不论它们的政治立场）。

由此，“入关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问题就浮现了出来。众所周知，推动我国现代史学科学化浪潮的执牛耳者是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傅斯年主张，“历史学便是史料学，也只是史料学”。史料整理工作之所以能成为科学，首先是因为史家可以做到“客观地处理”材料；其次是因为史料整理可以使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工具”，可以集科学方法之大成。从这个角度上看，“边政学”“骑马民族说”和“新清史”有自成体系的史料整理工作，而“入关学”则没有，因此它不具备现代史学的科学性。

既然“入关学”理论的展开不是从内容出发，那么就要从其所处的场域中寻找，即网络社群的哪些要素塑造了“入关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图景。首先，我们需要先把“入关学”话语体系中的各要素罗列出来。之前，已经有网友整理完成“入关学”相关概念术语的古今对应关系，但是较为散乱（见表2）。

表2 “入关学”相关概念术语的古今对应关系

大明 / 中华	美国
建州女真 / 蛮夷（建州女真是后来建立清朝的统治者的民族）	中国
入关	地理上指马六甲海峡，广义是通过掌握贸易航道挑战美国的世界秩序
成化犁庭（1467年9月份，明宪宗下令进剿建州女真，“捣其巢穴，绝其种类”）	种族屠杀
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建的城堡，后金首都）	北京
赫图阿拉算各部间的旧账	中国历史
四书五经 / 圣贤书	西方金融、政治、社会等各种思想
儒学大师	为西方思想唱赞歌的学者
剃发易服	全盘西化 ¹
剿匪安民	彻底消灭与清算北美匪帮的金融铁骑及其走狗
闯王来了不纳粮	不利用国际贸易与结算体系为自己牟利
蹲鹰和挖参 / 海东青、高丽参（女贞给明朝上贡农产品的工作）	低端产业
敕书（明朝发给女贞的封臣证明）	国际贸易体系准入证
叶赫部（满清八大姓，明末与爱新觉罗氏有巨大矛盾，受明朝册封）	香港、台湾等受西方资助的分离势力总称
金融铁骑	全球金融投机客，eg. 索罗斯
颜色卫兵	以策动颜色革命为生的人，eg.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反俄产品链
白甲巴牙喇勇士（满族军队的一种作战单位）	军队中坚力量
苏松二府、秦淮河畔、东林书院（明朝治下的社会系统）	美国令人向往的繁荣生活

资料来源：知乎专栏（知乎 @ 太师董卓）

图表注释1：笔者认为应改为“构建有利于己方的全球主流文化”。

如果从勾勒“入关学”的世界图景的目标出发，就可以发现这些要素可以分为角色类（大明、建州女真、叶赫部、儒学大师、金融铁骑、颜色卫兵、八旗、白甲巴牙喇勇士）、道具类（四书五经、圣贤书、明朝颁发的敕书、赫图阿拉各部之间的旧账）、地理场景类（山海关、赫图阿拉、苏松二府、秦淮河畔、东林书院^①）和战术动作类（挖参、蹲鹰、犁庭扫穴、剿匪安民、闯王来了不纳粮、剃发易服）四类。

通过重新整理的结果，可以看出：入关学理论图景展开的方式更类似即时战略类和寻宝类电脑游戏，而非地缘战略思想。“入关学”理论言说的起点是大明和建州女真两大共同体文明程度的差异，组成话语体系的各要素可以分为“功能性”和“战略性”两类。表格中的“道具类”和“地理场景类”要素属于“功能性”要素。建州女真一旦获得了明朝的敕书，就可以合法加入明朝主导的国际秩序；一旦攻克了山海关、苏松二府等战略要地，就获得了战略主动权和丰富的经济资源——这和战略类游戏“攻一城，升一级”或者寻宝类游戏“取一宝，升一级”的逻辑是一致的。“角色类”和“战术动作类”要素属于“战略性”要素。角色定位反映了大明和女真两大阵营各行为体的文明水平、战略文化。换言之，就是将大明和女真的攻防定位和行为取向模式化，将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复杂的军情民情简化为“一攻一守，各出各招”的两极格局。而各种博弈行为则更进一步将大明和女真经济形态（挖参、蹲鹰）及战略举措（犁庭扫穴、剿匪安民）简化为一个个“一步到位”的战术动作。简而言之，“入关学”对17世纪东北亚历史做出的裁剪是：故事场景简单化、角色定位模式化、地理要素关卡化、文化典籍道具化、战略进程瞬间化。这种裁剪方式比较符合网络辩论“你来我往、见招拆招、梗喂迭出”的对话模式，但与历史的真实性和地缘战略的科学性有很大距离。

“入关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国际领导权的转移，但从根本上说，塑造网络论战的是受众基础，而非其议题归属的学科领域。这里的受众基础包括两个方面：知识背景和进入“键政圈”的切入点。一方面，“键政圈”的多数作者和读者的知识背景以历史、军事和当代时政为主，重视概念创新和理论推演的社会科学（政治学、社会学）并非他们所长。即便有人关注经济议题，所采用的也是“工业党”推崇技术的视角，而非以数理模型为主的现代经济学。另一方面，他们进入“键政圈”的切入点也常常是战略类游戏或实证导向的动漫作品。前者聚焦特定战争场景中不同国家武器性能的对抗，例如《坦克世界》《红色警戒》等等；后者最典型的代表显然是《那年那兔那些事》及其衍生作品。事实上，随着范围越来越广，“入关学”的代表性词汇也和《那年那兔那些事》中的“兔子”“鹰酱”等词汇一样跳出了原生议题，成为了整个“键政圈”的流行语。

（二）话语的实质

既然“入关学”的起点是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场景，指向的是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格局，然而其话语体系展开的逻辑并非其标榜的地缘政治学，而是网络社区和网络游戏塑造的产物。那么“入关学”究竟是什么呢？综合上述诸要素，我们可以发现：入关学的本质是自媒体时代娱乐化的影射史学，其基本特点是内容生产个人化、推演逻辑娱乐化、传播方式粉丝化。这样一套话语体系的结构是“一条逻辑+一套话术+一组史实”。

^① 此条为笔者所添加，指以美国“常青藤”名校为中心的学术重镇和精英再生产机制。“东林书院”是“入关学”中的常见意象之一。关于东林书院在明中后期政界和学界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可参见〔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潘荣涓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将“入关学”定位为影射史学，是因为它的确具有影射史学的特征。“入关学”采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并且立场倾向非常鲜明，不仅包括对两国国运的预判，而且还特意通过修辞手法的运用对异见者进行了讽喻（例如“自有儒学大师为我所用”）。

但“入关学”与比如“文革”时期影射史学有许多不同之处，诸如内容生产的个人化和推演逻辑的娱乐化。

首先，影射史学的代表性文献是由“梁效”“罗思鼎”等写作组秉承“四人帮”的意志撰写出来的。尽管团队写作是常态，其文风仍然较为整齐划一地体现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意图。同时，参与各种写作组的笔杆子们有强烈的“政治变现”的愿望。而“入关学”话语基本是“山高县”、曹丰泽等人在个人创作的基础上和读者不断互动的结果。“入关学”的话语中有一些松散的、不自洽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出不同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比如，裴宜理注意到“文革”语言中有大量喻体变为本体的现象。这在“入关学”及其衍生出的讨论中也有体现。“山高县”、曹丰泽及其追随者们常常在明清鼎革和中美关系之间来回跳转，既用明清时期的典故来预知、类推当代，也用当代社科术语来总结明清两朝历史。其中固然有一些精辟之见，但也难免有许多穿戴帽、削足适履的现象。^①而且，他们似乎也没有将“入关学”带来的知名度和流量变现的意图。

其次，文革时期的影视史学推演逻辑是围绕着攻击目标而展开的。“四人帮”要打倒的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干部，影射史学的主要议题就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所以，当时的影射史学笔调特别阴沉。“儒法斗争史”旨在通过批“宰相儒”来攻击周恩来总理，“吕后”“武则天”意在吹捧江青是“红都女皇”，“巴黎公社与工人武装”的问题则是暗指“四人帮”的爪牙在上海组建的工人民兵。“入关学”的笔调则轻松得多。“山高县”一句“我蛮夷也”幽默地表达了对居高临下姿态的“公知文体”的拒斥。“皮卡，牛排，大豪斯（House）”是对于美式生活方式的意象罗列，已经接近于《欢乐颂2》的插曲《咖喱咖喱》。



图3 “我蛮夷也”呈现的是轻松自信的形象

“入关学”传播方式的粉丝化可以在其与其他“学”的相互参照中得到印证。大多数热议的“知乎键政”话题都经历了从单一的“梗”升级为复杂的“学”的过程，例如“六学”（Sixology）和“王学”。“六学”是兴起于2016年、蹿红于2018年底的一种具有讽刺性质的文化现象，主要指向六小龄童（原名章金莱），并以其言论、行为、作品及他人对其评价等为素材，进行讽刺或改编。

^① 李逊、裴宜理：《革命的粗野》，《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4期。

网友们以网络狂欢的方式，完成了“六学”的“学科建构”。“知乎大V”毕啸天甚至列出了“六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数学公式、病理性质等诸多内容。同样，也有网友整理了“入关学”的概念体系、学派迭代、前沿进展等方面的内容。^①“王学”则是对研究者过度诠释的一种调侃。《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二部）出版后，红学会会长张庆善在质疑刘心武对秦可卿身世地位的过度诠释时，说“‘学’是一个系统的知识和学问，他这样研究秦可卿就说是‘秦学’，那么研究王熙凤就可以说是‘王学’或叫‘凤学’，研究贾宝玉就是‘贾学’……是不是有点开玩笑？”“入关学”并不回避网民对其“过度演绎”的指责，甚至有意将史实类比演绎成“谶纬之学”供读者娱乐。因此，如果将“入关学”译成英语的话，可以参考“六学”（Sixology）将其后缀定为“-logy”，而非“Discipline”。因为“Discipline”的词义比较严谨，指称特定科学门类时，包括某一研究领域、一定单位的教学内容和必须遵守的学科规范等含义。

三、“入关学”与网络舆论生态

（一）“入关学”话语中的知识分子网络形象

在“入关学”历史叙事中，知识分子的形象是偏向负面的。众所周知，在品评异见阵营的知识分子时，不同时代、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话术。拿破仑用“意识形态（分子）”（ideologist）来斥责特拉西；托克维尔青睐“文人政治”的概念，雷蒙·阿隆有《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有《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山高县”则主张“入关前不要抱着圣贤书胡思乱想，入关后自有正统儒学大师为我所用”，这种主张也被简称为“不辩经”。这里的“儒学大师”既是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喻称，又是对明清鼎革之际投降清朝的官僚士大夫的揶揄。

在品评中国古代史时，自由主义阵营常常指责法家人物为“酷吏/鹰犬”“独裁者之师”，并用韩非、周兴、来俊臣等人来喻指对立面命运；而左派阵营则常用“衍圣公”世家和东林党人在明清鼎革之际的政治选择，来嘲讽自由派表面上崇尚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实则言行不一，畏威而不怀德。

“衍圣公”世家和东林党人的案例确实比较契合北族王朝南下的历史场景，因而在网友的讨论中也成为了“入关学”的论据之一。靖康之难时，衍圣公孔端友南下。但是，其异母弟孔端操却主动投降金军，成为北宗之始。到了蒙、金、宋并立时，三国各自扶持自己的“衍圣公”，以至于天下同时有三个“衍圣公”。1644年，顺治帝在北京登基。被崇祯册封的衍圣公孔胤植随即向其进献《初进表文》，自称“臣等阙里竖儒”，歌颂顺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六宇共戴神君”“八荒咸歌圣帝”等。1937年，时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又有“江川珠泗源流合，况是同州岂异人”的诗句，被时人怀疑暗合“中日同文同种”。曲阜沦陷前，孔德成在国民党军队的保护下前往重庆，由孔令煜代理奉祀官处理府务。孔令煜竟然为汪伪政府站台，在电台上公开发表《复兴东方文化 击灭宿敌英美 完成大东亚圣战》一文，称“友邦日本……即

^① 例如太师董卓：《如何给一个入关论小白，从头科普入关论？》，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4349190/answer/1155761547>；文言文语：《当今键政三种流派浅说（一）何为“入关”“翦商”“曹学”？》，知乎，<https://zhuankan.zhihu.com/p/138951544>；文言文语：《当今键政三种流派浅说（二）各学派主要异同》，知乎，<https://zhuankan.zhihu.com/p/138824318>；等等。

著先鞭，我国当策后效，以与之共存共荣”。东林党领袖之一钱谦益身陷的舆论漩涡就更为复杂。经历了福潞之争、剃发降清和暗通明军，钱谦益已经成为满蒙亲贵和明朝遗民共同嘲讽的对象。乾隆帝将钱谦益列为《明史·贰臣传》之首，并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诸如“水太凉”“头皮痒”“两朝领袖”等或真或假的“黑料”更是流传甚广，以至于需要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为其辟谣。

这种舆情态势的根本原因在于互联网的舆论环境。网络舆论空间有着开放性、多元性、交互性，所以网民在参与网络讨论时往往有着潜在的平等诉求。在近年来“知乎键政圈”思想转向中，此前积累的对“公知”话语垄断的不满很容易转化成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拒斥，甚至延伸出一种粗野化的文风。例如，在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网络论辩中，有网民为了论证“东林党文人是沿海商业利益集团的代表”，竟然主张为魏忠贤翻案，甚至高呼“忠贤不死，大明不亡”。这种怪论显然经不起历史学的检验，但客观上反映了知识分子群体在网络舆论中的形象问题。

裴宜理在分析“文革”语言时，就注意到一种现象：“纯净规范的语言被视为与造反精神不相容的循规蹈矩；礼貌委婉用语更是被视作‘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臭礼节’，仿佛越粗俗便越接近工农兵，越没有教养便显得越革命”——即“革命的粗野”。^①这在“入关学”的话语中也有体现。不过，“入关学”的粗野不是体现在攻击性的语言上，而是体现在对国际规范的看法上。

有中国学者在评论西方关于“国际社会”的观念时，就提出了一个“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的命题。这一命题指出，在西方长期主导的国际社会中，“文明标准”也曾经是一个和殖民主义密不可分，因而声名狼藉的词汇。冷战后，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提出“新文明标准”（New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民主和人权被视为其中的关键要素。一些不符合“新文明标准”的非西方国家可能被国际社会视为“不够文明”的国家，甚至“无赖国家”（Rogue State）。^②“入关学”把当代中国明确定位为一个奉行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的“修正主义国家”，所以本能地不承认国际规范的演化。它在批判西方意识形态时，走了一条“开倒车”的路，即把殖民扩张时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视为永恒真理，用于否定现代国际规范的进化。换言之，就是“用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大儒”。这也正是许多非粉丝的读者感觉和“入关学”话语“始终不在同一个频道上”的原因。

另外，“入关学”主张“不辩经”，难免会让人想起改革开放初期的“不争论”，但是两者有着本质区别。在“入关学”的话语中，“经书”和“大儒”指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及其代言人，是否定和批判的对象。另外，“读经”在“键政圈”成为负面意象，还和此前全网热议的两个“梗”相关。其一，知乎上有一个长盛不衰的议题：“历史上有哪些疑似穿越者？”许多网民酷爱调侃王莽政权脱离具体国情的复古改革是“读经中毒”，并以此来揶揄国内自由主义阵营的“皈依者狂热”。其二，是2016年以来由《新京报》对于“读经学院”的报道引起的学界大讨论。^③而“不争论”是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前提的。邓小平同志提“不争论”不是说“不读经”。相反，邓小平有着将“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相结合的非凡理论魄力。他不仅高度重

① 李逊、裴宜理：《革命的粗野》，《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4期。

② 张小明：《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

③ 《新京报》记者罗婷，实习生汪婷婷、付子洋：《读经少年：背了十年书，识字却成了问题》，《新京报》，2016年8月29日，第A14版（特别报道）。

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而且引导全党通过加深对马克思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的认识来理解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二）“入关学”权力观的缺陷

“入关学”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排斥和粗野化的文风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轻视，这反映了其权力观念的缺陷，也是其分析框架的不足之处。事实上，一个新兴强国要想建立起稳固的国际主导权，恰恰需要组合运用多种类型的实力——这也是政治学界的共识。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在《社会权力的基础》中提出：社会是由相互重叠交叉的权力网络构成的。组成社会权力网络的权力包括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①而国际政治学对国家实力/权力的概念描述，则呈现出迭代发展的面貌。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后先后引起热议的“巧实力”（Smart Power）和“锐实力”（Sharp Power）都是对既有的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补充与重组。

在国内的阶级政治中，文化领导权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要素。葛兰西认为，国家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政治社会主要行使强制职能；市民社会则包括创建新的意识形态和散布统治阶级思想的社会机构和技术手段。在分析东西方革命时，葛兰西指出：“政治社会就像现代战争防御阵地外围的堑壕，而在它的后面矗立着堡垒和强大的工事结构——市民社会……它就像现代战争防御阵地中具有相当强大威力的防线，有时似乎猛烈的炮击已经破坏了敌人的全部防御阵地，但实际上只破坏了它外部的防线。”^②无产阶级革命要想获得真正的成功，就必须在市民社会层面上夺取文化领导权。

在国际政治中，威望和声誉也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资产。有学者将“威望外交”定义为“寻求权力与承认的政治”。它由四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因素构成，即战略意志、战略威慑能力、国家信誉和战略边疆。同样，国际声誉和威望也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布斯曾说，“权力的声誉本身就是权力”。汉斯·摩根索认为，良好的声誉可以使盟国保持忠诚、削弱敌对盟国的团结，并赢得中立国家的支持。爱德华·卡尔指出，国家之间的交易和谈判结果主要取决于参与各方相应的威望。可见，作为软实力的声誉和威望对硬实力的增长有重要促进作用。对意识形态和国际声望的忽视，不仅是“入关学”过于粗犷的地方，也是其权力观念的不完善之处。

因此，如果要挖掘“入关学”对当前我国政治话语建设的正面意义，就应当结合较为规范的政治学理论，从国情国力分析的方向着手对其进行改造，从而使之具备参与学术对话的能力。“入关学”话语的核心是“山海关”的含义。“山高县”认为，“山海关”狭义上指马六甲海峡，广义上指美国控制的国际贸易通道；“入关”即占领山海关、马六甲海峡这样的战略要地，从而挑战大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如果要把“山海关”这一概念推广到国际政治学领域，那么它实际指称的是崛起国与守成国战略竞争中的某个重要节点或瓶颈。内外形势跨过了某一节点或者综合国力打破了某一瓶颈，形势就会不可逆转地向领导权转移的方向发展。它更多偏重于时间因素，而非地理因素（某个军事和贸易重镇）。这类概念中，既有带有积极色彩的，例如“奥古斯都门

①〔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②〔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35—236页。

槛”；^①也有带有消极色彩的，例如“修昔底德陷阱”中的“台阶”。

后金 / 满清是在进入山海关后，才具备了打破明朝战略遏制，进而逐鹿天下的资格。此后，清朝的长期任务便是推动综合国力的均衡发展，补齐迈克尔·曼所说的权力网络中的短板。例如，在政治领域，融合满汉制度，打击明末党争的余波；在经济领域，巩固对江南财赋重地的控制，推行税制改革，加强财政汲取能力；在意识形态领域，通过“文字狱”和开科取士两手抓的方法，控制汉族知识分子群体。在平定三藩之乱和清准战争中，虽然八旗的军事素养明显下降，清朝仍然凭借综合国力的优势赢得了胜利。可以说，满蒙亲贵集团到了这个阶段才完成了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入关”，跨过了“奥古斯都门槛”。今天的中国需要超越入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寻找、创造类似“奥古斯都门槛”的新概念和新实践。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①“奥古斯都门槛”源于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对奥古斯都改革的总结。他认为，正是屋大维改革创立了有助于罗马帝国长期存在的结构。在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后，无计划的肆意扩张和与之紧密相连的内部冲突和内战也随之结束。罗马帝国统治进入了长期的稳定状态。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unkler）做了进一步阐释。详细参见〔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阎振江、孟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68页。